

追寻中华文明七千年

——评《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

李建国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003)03-57-2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蒋南华教授在中国古文化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他的代表性重要成果《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近期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无疑可以看作学术界一项引人关注的重要成果。此书披露的虽然系作者一家之言,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课题、以及作者特有的学术见地,是不会不引起更大的关注和值得长期的研讨下去的。这里,我们简单地将全书要点作些评介:

一、光辉灿烂七千年

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证实,我国天文历法的文明史也不是从唐虞之世开始的。《周骨算经》、《尸子》、《帝王世纪》、《易经·系辞》、《楚帛书》、及《通鉴外纪》均云:伏羲神农“立周天历度”,“正四时之制”,即在“黄帝调历以前,(已)有上元太初历”了(《史记·索引》)。根据《史记·历术甲子篇》推算,我国的上元太初历当产生于公元前 5037 年的炎黄时代。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文字和习俗的形成,是这个民族千百万年以至好多万年生活的积淀,决非是一朝一代所能形成的。我们今天见到的甲骨文,它是以结绳、绘画及图象符号等为基础、经过几千年的缓慢演变和积淀发展而约定俗成的产物。在殷商甲骨文以前,据《尚书·序》记载:“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即是说,神农时代已有正式的文字和书籍了。后来的人们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为“三坟”。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为“五典”。西安半坡、庙底沟及山东等地龙山文化遗址、湖南长沙南郊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文字符号陶片是殷商甲骨文之前以至距今七千年以前已有文字的有力旁证。

种种事实充分说明,我国唐虞和夏代的文化文明,既是炎黄时代文明的继续,也是商殷乃至周代文明的起点。而在炎黄时代(即公元前五千年以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因此,我们应当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早在七千年(而不是以往所说的五千年)以前,中国就开始了灿烂的历史文明!

二、昆仑发祥与炎、黄

远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两位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一位是炎帝神农,一位是黄帝轩辕,他们被称作“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和人类文明的开创者。

火帝神农,号烈山氏,姜姓,公元前 5080 年(辛巳)生于湖北随州厉山镇九龙山南麓的烈山。《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姜姓,“母曰任以,有娇氏女,名曰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因“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班固《白虎通》)。他“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周易正义·系辞》疏)其卒年为公元前 4960 年(辛巳)。其墓在今湖南酃县塘田乡。

晚于炎帝的黄帝轩辕氏,姓公孙氏,公元前 4600 年以前生于轩辕之丘,长于姬水,身怀“上德之瑞”,国于有熊。故亦曰有熊氏,在位一百年而崩。黄帝及其子孙相国首领的黄帝部落联盟,以西北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为主要基地,“穿井”,制陶,炼石为铜,铸鼎,命西陵氏(螺祖)劝蚕桑(路史),“作舟车以济不通”(《汉书》),“作冕”(《世本》),“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汉书·律历志》下世经),“建宫室,以避寒暑”,(《白虎通》),“作弩”,命“苍颉作书”,“令伶伦作为律”(《造律吕》),作图画,“户画神荼,郁垒与虎”等(《古史考》、《吕氏春秋》、《论衡》),并“执绳而制四方”,“乃经上地,而井牧其田野”(《淮南子》等),领导人们发展黍粟等旱季农作物。

三、西周王年与文献、考古

《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一书特别引人关注的,自然是有关中国历史纪年的问题。对此,国内学者多有探讨,已有不少意见认为中华文明远非五千年,而是六千年以至七千年。是否只根据部分学者的推断与局部性的材料,就坚持原来五千年或者是四千多年,这不能不是两种相差多有的看法。该书作者可贵之处,不仅仅是同意并力主七千年的说法,并提出了有力的根据和推论。作者指出:“中国历史纪年始于何时?有人看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列从“庚申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经六个甲子,至“四十三年敬王崩”,连续 365 年的历史年表,就认为中国的历史纪年开始于“共和元年”,似乎共和以前的古代纪年便成了“空白”。

阅读《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等,可知,司马迁所记西周时代鲁国各公年次,除代周公“就封于鲁”的伯禽之在位年数未具体言明,炀公在位 60 年脱误成 6 年外,其余各公在位年数历历分明。只要我们将伯禽自武王克商 2 年后即崩,成王即位,周公辅助成王摄政“七年”,“还政成王”。“后三十年四年……已丑成王崩”(《世纪》),即将成王在位 37 年之数 and 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之数(即伯禽在位 53 年)加上,就能精确得出武王克商之年起整个西周时代的王年总数,并确认大家所惯说的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之后的史实。从武王到孝公 25 年为 336 年,而“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为公元前 771 年,以 $336 + 771 - 1 = 1106$ 年,这不就是西周开始之年,即武王克商之年吗? 怎么是“断代工程”所言的 1064 年呢? 这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鲁周公世家的纪年比“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前推了 265 年($1106 - 841 = 265$)! 即使不记伯禽在位之前的年数,鲁周公世家也较共和元年,早出了二百多年。我们岂能不顾事实,妄说“我国历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呢?!

中国历史纪年,古代除用帝王纪年法外,还使用了六十年为一周期的干支(即甲子)纪年法来纪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庚申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甲子(共和)五年”、“甲戌宣王元年”、“甲申十一年”、“甲午二十一年”、“甲辰三十一年”……迄“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一共六个多“甲子”,凡 365 年,有条不紊,我们不能谓古人不以甲子纪岁。《货殖传》云:“太岁在卯,穰;明岁衰岁,至午,旱,明岁美。”此亦甲子纪岁之明证。

共和元年不是甲子而是庚申,可见甲子纪年早于共和元年就已使用。《历术:历记·甲子篇》所列一部(甲子部)七十六年,用的就是干支的别名,即太岁纪年法来记载的。甲寅年记为“瑞蒙单阙”……经考证史迁的这个历术甲子篇用的是公元前 427 年(即周考王 14 年)之“历元近距”。因为这年的干支不是甲子而是甲寅,因此,能称为“近距”。从甲子到甲寅中间相差整整 50 年,也就是说,只有公元前 477 年才是甲子。但公元前 477 年就不能称为“历元”。这个四分历术的真正历元必须是始于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合朔并交冬至,即冬至点在牵牛初度的历法。这被人们称为“天元甲子历”,经考证和推算,它创始于公元前 5037 年的前子月初一的零点零分;而人称“天正甲寅历”,则是晚于它 470 年即为 4567 年之甲寅黄帝历。这时正是我国历史上的炎黄时代,也就是说,干支纪年在炎黄时代就已创制实行了。

总之,蒋南华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将天上、地下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参证比较,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有关中华文化系统的认识,即中华文明远不止于五千年,而是七千年。